

发展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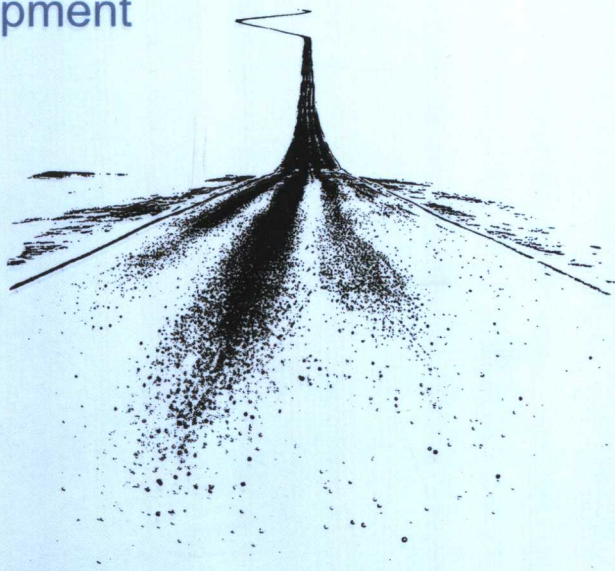
〔美〕德尼·古莱 (Denis Goulet) 著

残酷的选择

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The Cruel Choice

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展研究译丛

〔美〕德尼·古莱（Denis Goulet）著

高钰 高戈 译

残酷的选择

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The Cruel Choice

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 [美] 古莱 (Goulet, D.) 著；
高钰，高戈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发展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80230 - 750 - 6

I. 残... II. ①古... ②高... ③高... III. 发展经济学—研究
IV. 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1404 号

Denis Goulet

The Cruel Choice:

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 1985 b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本书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前言

本书旨在就道德价值领域掀起一场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论^①。我将明确阐述我的价值观，以此抛砖引玉激发人们更多的思考、批判和试验。本书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其最基本的问题既不是经济或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在技术普及、各国互相依赖的当今世界里，什么样的生活好、什么样的社会好？物质的丰裕一定会带来生活的充实吗？人类发展是否不仅仅意味着现代科层制度、高效技术及高生产力经济这三者的系统结合？

我研究发展道德学的一个方法是，将实际生活中的观察结果以及我在不发达地区参与计划制定或者作为无名小卒所经历的体验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且思考“普通百姓”的证词。后一点非常重要；确实，我赞同丹尼洛·多尔西的观点，即“任何由局外人所作的研究其价值都比不上人们所作的自我反省”。^② 我的理论分析基于如下两点：“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谓脆弱性，即是人们在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形，就目前形势来说，它是指不发达社会没有能力应对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说理解“脆弱性”这一概念是理解不发达状态及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经验、符号及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复杂世界可以围绕这一概念而得到有效的整合。而且，

① 这些词语的意义请参阅《附录一》中“道德”与“发展”二词。

② Danilo Dolci, *The Man Who Plays Alone* (Pantheon, 1968), Introduction, p. x.

“脆弱性”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出发点，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不发达状态视作最初的环境，而将发展视作变化的过程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很多低收入国家，脆弱性体现在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这一事实上；而在已经实现繁荣的某些社会里，脆弱性体现在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上。

而“存在理性”指的则是所有社会都采用的用来处理信息和作出实际选择的战略。这些选择旨在保证其生存和满足他们对自由与尊重的需求。这些战略多种多样，而且受到无数的限制。“存在理性”这一概念是我的观点的中心。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因此在目前的条件和信息水平状态下，一个社会是追求发展还是拒绝发展取决于该社会是否视变革为加强国计民生、提高威望和获取更多自由的手段。

脆弱性和存在理性两者紧密相连。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世界范围的生态、符号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它在“存在理性”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程度也就有多大。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同样如此：技术上相对不太脆弱的团体比其他组织更有能力处理与自身生存和需求满足相关的信息。

如果我们的分析围绕这两个结构展开，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发展这一概念完整的历史意义。技术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从来都不会在历史真空中发生。只有在那些存在着多种刺激因素的地方才会出现创新。从地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发展，其开始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本书分析了社会中各种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要回答的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世界中，什么是构成优质生活与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本书从头至尾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人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如果要使不发达国家成功地进行文化革命，发达国家也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今的发展形象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形象，有关发展手段和目标的正统观点也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道德理论家，所有关心发展的人士都必须考虑新的可能性。

脆弱性这一概念是我研究发展目标以及充满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心思想。因为发展经验根植于历史之中，所以最初的变革所具有的破坏性也需要解释。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行动纲领，任何发展道德都毫无用处。最后我们将衡量道德，但并不注重对它分析得如何精练，而要看它开出的药方是否真正实用。

这里所提出的具体道德战略符合第六章中所解释的三项调节原则。而无尽的任务便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此产生出批判性的思维并且将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

本书既不是手册也不是教科书。虽然很多发展问题引出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适当战略的需求，但我并未试图在本书中面面俱到地加以阐述。因此，如果读者试图在本书中寻找详细的人口战略方案，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我在第十二章中也简单地阐述了人口统计学的生态意义。道德问题现时变得显而易见：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须按照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制定。然而，即使是大规模的生育控制政策也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需求，如计划资源、选择性投资、扎实的教育战略、奖励政策等等，特别是，要消除统治与被统治的体制结构。简单地说，计划生育并不是万能药方。同样，本书也并未提出任何正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那些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社会应当吸收什么水平的技术，是最尖端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中等技术，还是刚刚被淘汰的技术？另一个问题是，对那些“发展工作者”来说，什么才是跨学科教育的最好内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每一个都需要一本长篇巨著来阐述。

然而考虑到它们的迫切性，本书在三个领域略述了一些说明性的战略：民主计划、技术合作和价值转换的创建。所谓民主计划，是指受其影响的所有人都能对其加以控制和作出反应的计

划。技术合作则是指在技能或者信息的转移过程中不会导致或者加强较为“先进”的一方的统治地位。最后，价值转换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适当的次序来进行。本书中间部分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

采取这些战略会导致什么样的发展呢？很显然，它不会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现时所称的“发展”其实是反发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呢？如何利用世界资源来满足所有人的优先需求呢？最后，对那些一心主张打游击战的革命党人，伦理学家们如何劝说呢？本书最后几章便要探讨这些问题。本书最后三个附录详细定义了“道德”和“发展”这两个名词，讨论了道德价值对政治力量的影响，同时也稍稍阐述了研究价值转换的方法问题。

发展道德学广泛吸取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计划人员和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关于发展的定义，而道德学则将所有的定义纳入一个宽广的框架里，在其中发展意味着，生活的质量与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表达的价值观。和已经去世的勒布雷特一样，我也认为发展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过程，既是突然的也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民脱离被视为“不太人性”的生活模式而进入被认为是“更具人性”的生活模式之中。如何取得发展和在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这两点此时变得同等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创建一种延伸至整个世界的新型团结，并且，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也必须得到培育。最后，所有社会和个人的互相尊重和自由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政治、教育或者社会现象来研究，但它最终的目标是生存：向所有人类提供一个机会使其生活得更富有人性。如此理解的话，发展便是指所有人类和社会之整体人性的提升。

本书是受“发展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委托而写。我非常感谢该中心从1968年8月至1969年1

月所提供的资助。中心主任拉姆所组织的关于本书最初大纲的评估讨论会对我帮助非常之大。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士表示感谢，同样感谢德雷赫所提供的秘书工作。

本书手稿的最后几章是我在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民主机构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时所完成的（1969年2月至7月）。该中心提供了一个讨论本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独特对话场所。中心秘书处人员愉快地帮助我完成了最初几稿的打字工作，我特别感谢吉文斯在打字方面的持续帮助。“人类研究院”与“欣鲍姆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得以完成最后大幅度的修改工作。

我的同事们提供了宝贵建议。我尤其感谢考廷霍和盖勒两位，他们对本书最初几稿提出了批评建议。法图罗斯、高曼、格林肖、哈根、希金斯、赫希曼、霍洛威茨、伊利奇、杰克逊、贾考贝、贾瓜利贝、马库莱斯库、苏亚雷斯、沃尔肖克和沃威克等众多人士也作出了宝贵的评论。所有的建议都是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提出和接受的，因此我对本书现时的内容负完全责任。

平装本前言

“发展”——还是解放？^①

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人士现在开始抨击一些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揭露他们言词的欺骗性。比如，秘鲁神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便说：“‘发展’一词含有贬义……现在它正慢慢被‘解放’一词所取代……只有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拉丁美洲才会有真正的发展。这当然表明，我们需要与资本主义的天然盟友即我们国内的寡头政客作最后的斗争。”^②

古铁雷斯是“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言人。在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地方，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召开了无数次的讨论会和大会。对于古铁雷斯以及古斯塔沃·佩雷斯、勒内·加西亚、鲁本·阿尔夫斯、胡安·塞贡多、卡米洛·蒙卡达、埃米略·卡斯特罗^③和其他很多人来说，“解放”一词比“发展”更好地表达了人们希望有更具人性的生活条件的真

①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Vol. XIII (No. 3), 1971/3.

② Gustavo Gutierrez Merino, "Notes for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Theological Studies*, Vol. 31, No. 2 (June 1970), pp. 243-261.

③ 他们的著作主要见 LADOC (Latin American Bureau, U. S. Catholic Conference), ISAL (Iglesia y Sociedad en América Latin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SYMPOSIUM* (in Spanish), Bogota.

正愿望。古铁雷斯并不试图检讨自 1947 年马歇尔计划以来关于发展定义的所有变化，因为这一任务已有其他人完成了^①。他集中精力批判性地探讨了三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得到“发达”国家多数专家的认同。

关于发展的三种观点

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发展等同于可以用总数衡量的经济增长。他们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并维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500 美元（依照某些观察家的观点）或者 1000 美元（依照另一些观察家的观点），而且其年度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5% ~ 7%，那么该国便是发达国家。按照这样的标准，某些国家高度发达，而在最底层的国家则属于不发达或者未发展国家行列。在同一经济体内，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划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虽然这样的观点现今已经受到普遍批判，但它仍具一定的影响，原因在于像沃尔特·罗斯托所著《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及其他人的著作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经济学家在计划制定过程中仍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口头上声称要重视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因素，但他们仍然将自己的增长模式的实际要求放在主要地位，而将其他非经济因素放在次要地位。

第二种观点当今更为流行。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的开头，吴丹曾总结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这一公式的弊病是，它要么表达太多，要么表达太少，因为并非任何增长都合适，也并非任何变革都合适。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则采纳这一观点的某个变体作为发展的可行定义。这一定义的范围之宽广足以容纳多种多样的变化过程以

① Jacques Freyssinet, *Le Concept de Sous-Développement*, Mouton, 1966. 关于“发展”不同意义的简要回顾请参阅 Denis Goulet, “That Third World,” *The Center Magazine*, Vol I, No. 6 (September 1968), 47 - 55.

强调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因素。然而，社会科学家们几乎总是把有关人类目标的价值判断放在次要地位，而将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新型社会劳动分工的创建、现代体制的追求和高效生产思想的传播放在首要地位。最后一点得到很多人的具体阐明，这些人认为，所谓“现代性”并不指工厂是否林立，而是指有关工厂的某种确定观点是否存在。

然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专业词汇的背后，人们普遍认为，“发达”社会应当成为其他社会所效法的模式。一些热衷于减少文化歧视的观察家则拒绝那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应当效法他人模式的观点。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认为现代模式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它带来的示范影响以及现代社会的技术渗透力已经遍及世界。

发展理论的第三种流派则强调道德价值观。在某些方面，这一学派被视为少数派异端邪说。该学派的中心思想强调所有社会、所有团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的质的改善。他们认为，虽然人们必须有足够的物质才能生活得更具人性，但发展本身只不过是提升人性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一流派有时被称为“法国派”，因为其主要倡导者来自法国，比如经济学家佩鲁、社会计划者勒布雷特、理论家奥斯特律、实践政治家比隆和菲利普等等。按照这些人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社会变革应当被放在最广泛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在这一背景下，所有人类都接受召唤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的观点对联合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其最深的影响则表现在论述发展的宗教文章中，比如罗马教皇的通谕、世界教会理事会和主教公正与和平委员会所发表的文件以及数个国家内部的大主教的通信往来。从地理位置上说，法国派影响较为显著的区域是拉丁美洲。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铁雷斯所得出的结论尤其重要的原因。依据他的观点，考虑到法国派的历史渊源及其对社会目标规范的主张，该学派是他所批判的三个观点中错误最少的一派。然而，他

也声称，表达法国派几乎未触及的现实情况的最好词汇是“解放”而不是“发展”。如果使用后一名词的话，法国派就不能非常清楚明白地与其他学派划清界限。更糟的是，法国派的主要倡导者所使用的词汇如外国援助、技术合作、发展计划和现代化等等，语义都含混不清。结果导致在很多拉丁美洲人眼里，“发展”一词便带有一种贬义：它不能涉及问题的根源，却导致诸多烦恼。而且，“发展”并没有使非对称权力关系在世界上实行，也不能使许多国家的渐进变革模式导向合意的目标。因此，古铁雷斯说，最好还是使用“解放”这一词，因为它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世界市场力量所带来的统治关系、脆弱性和软弱的谈判地位，同时它还表达了对本国国内基本社会变革和对更自由的对外政策的需求。

关于解放的词语

用“解放”一词来替代“发展”即是要展开一场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所称的“为了自由的文化行动”^①。解放意味着取缔精英政治而将变革过程的控制权力交到广大民众手中。而在另一方面，虽然发展经常被用来描述各种变革过程，但它强调的是所谓变革带来的好处，比如物质繁荣、生产力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住房条件和医疗服务的改善、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就业的多样性等等。然而，这种观点有两个弊端：第一，它不加批判地支持那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上的做法，即使这样做会把决定权交到精英们的手中。这些精英包括训练有素的经理、能干的技术员、高水平的“人才”；第二个错误曾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巴林顿·穆尔所著《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一书中得到透彻的分析，即它

① Paulo Freire,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an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Monograph No. 1, 1970; and *Pedagogy of Oppressed*, Herder and Herder, 1970.

对暴力的破坏性视而不见，并且拒绝谴责合法变革带来的暴力行为。

在拉丁美洲，不仅神学家，而且社会科学家、计划制定者、教育家以及一些政治领袖都倾向于使用解放一词而不使用发展一词。他们揭示出传统智慧所隐含的价值假定，而代之以对自我发展的强调而不是依赖援助、外国投资和技术帮助。考虑到我已经在别处另写过文章详细批判了皮尔逊、彼得森、杰克逊和其他人所著的有关发展的报告^①，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重复这些关于价值假定的内容和这些报告的重大疏忽。重要的是，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会议上的第三世界发言人都肯定了这些批判^②。毫不奇怪，不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终于看清“发展”这一词其实只是诡辩之词。他们开始使用“解放”这样的词汇，这充分表明他们将奋力自我保护，旨在消除其结构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剥夺了他们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权。即使在没有获得解放之前，谈论解放也是取得文化自主权的第一步。他们最终所要追求的，是彻底改变主导社会与从属社会之间的关系、特权精英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人开始明白，“不发达”即意味着被打入历史的底层，亦步亦趋地学着别人的技术，而不是发明自己的技术。

在那些开始出现一种新型批判思想的社会中，更多的人们谈论解放这样的词汇。对这些社会来说，真正的发展模式并非像那些由美国援助机构资助起来的社会，如南朝鲜、希腊、中国台湾和伊朗。毫无疑问，这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

① Denis Goulet and Michael Hudson, *The Myth of Aid: the Hidden Agenda of the Development Reports*, IDOC Books, 1970. 这一著作包括两篇论文: Goulet, “Domesticating the Third World”, 和 Hud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

② Guy F. Erb, “The Second Session of UNCTAD”, *Journal of the World Trade Law*, Vol. 2, No. 3 (May/June 1968), 346-359. “The Latin American Consensus of Viña de Mar,” dated May 17, 1969.

在阶级关系及社会贫富和权力差别方面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结构上，一些重要的社会系统仍然是剥削性质的。另外，经济上的发展是以维护高压政权为代价而取得的。最后，正如一位欧洲人所说的那样：“美国的援助似乎只有在那些紧跟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里才会起到作用。”

拉丁美洲的革命家们拒绝这样的发展模式。他们把眼光转向中国、古巴和坦桑尼亚这些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大面积饥荒已被消除，封建的社会系统被打破，统治阶层的优越思想一出头即被铲除，技术进步让位于创造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新人类这样的努力。在古巴，尽管我们承认他们有很多经济上的失误，但这个国家已不再依赖美国，并且在苏联人面前也表现得越来越坚强，虽然它仍严重地依赖苏联在金融、技术和军事上的帮助。再者，古巴还引人注目地消除了文盲、分散了投资并缩小了城乡间的差别。坦桑尼亚也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它拒绝了大众消费模式，在其教育系统中采取自力更生的做法（鼓励农业技术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强调只适用于大型工程项目的纯科学知识），只接受那种不会在本国内部导致精英阶层出现的经济援助。总而言之，坦桑尼亚的政策是经济成就让位于建立一种基于古代公有制社会的新型的非洲价值观。

因此，对于解放主义者来说，成功并不仅仅按照利益的数量来衡量，而首先要以变革过程的方式来衡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当然要追求，但判断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一个社会以非精英的方式培育了更多的民众自主权、社会创造性而不是模仿，对社会变革力量进行控制而不是仅仅调整。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发达”社会是仅仅成为技术文明的消费者还是成为自身变革的主人？因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打文字仗。这场战役在两个有关历史现实的相互矛盾的解释之间打响，是两个关于社会组织的原则之间的竞争。第一个原则强调效率和社会控制高于一切，第二个原则注重社会公正和新型人类的创造。

发展问题的西方学者们怀疑“解放”这样的新词汇的正确性。作为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对其分析力量、解释价值和预知能力抱着怀疑的态度。然而，他们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证明自己无法描述现实，更不用说帮助人类以可以被接受的方式改造现实了。最近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社会科学家变得虚心了。比如，冈纳·缪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便承认他早期作为发展“专家”所犯的错误，他还在《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中向那些鼓吹价值中性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人提出挑战。而阿尔文·古尔德纳则更进一步，在其所著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一书中倡导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一个未来以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激进的社会学。经济学家埃格贝尔·德·弗里斯^①得出结论说，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理论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本身已经深深陷进认识论泥潭的西方发展学者们嘲笑新出现的理论是不明智的。

我们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的一些论发展、依附和统治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解释颇具说服力，分析精辟，对未来的预测有很高价值^②。即使从经济主义角度看，新出现的解放这一词也是中肯贴切的，因为它在所有层次上分析和揭露了依附和统治的结构本质。解放这一词揭示了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文化西方化给拉丁美洲带来的巨大的人性代价。这些论著所描述的现实是，在物质刺激面前，脆弱的社会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此外，他们所使用的革命一词具有高度的描述价值，因为它显示了这种无能为力现象的可逆性：如果统治是由人

① Egbert de Vries,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Development Theo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Vol. X, No. 1 (March 1968), 43-49.

② Cf., e. g., such works as F. Cardoso and E. Falleto,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Santiago, 1967; Theotonio dos Santos, *El Nuevo Caracter de la Dependencia*, Santiago, 1968; Celso Furtado, *Dialéctica Do Desenvolvimento*, Rio de Janeiro, 1964; numerous essays by Alberto Guerreiro Ramos (a Brazilian now teaching at UCLA), et al.

们所强加的一种状态，那么它也可以被人们推翻。最后，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词汇具有较高的预言价值，因为它可以动员集体能量为某种价值而奋斗，这个价值便是希望，它是所有成功的社会革命的推动力量。这种满怀信心的希望绝不是像基辛格等人所谈论的那种冷冰冰地对某种大概所进行的理性推算，而是一种勇敢的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测，这种可能性颠倒了过去、震撼了现今并且创造了未来。

起链接作用的“发展”一词

解放这一词尽管有其绝对的优势，但对“发达”世界的很多人来说，要在战术上理解和驾驭它是有难度的。该词所具有的历史内涵有时会令这些人抵制由其引发的各种运动，尤其当这些人本身并不是压迫者而只是非人性压迫系统的被动得益者时更是如此。另一类人也会发现很难响应这一词汇，这些人即是造反过来的专业人士，他们只需通过掌握其工具并且担负起第五纵队的任务与外部革命组织一起来推翻“这个系统”。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人需要继续使用现时存在的“专业”技术。正是有了诸如此类的考虑，我们才会提出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发展”一词是否能够起到动员的链接作用。如果我们同意政治学家哈维·惠勒的观点，那么答案便是肯定的。惠勒的观点是：

……我们并不拥有革命性的社会科学来满足革命的乌托邦需求，而那些博学多识能够创造出这种科学的人却脱离那些必须准备好迎接新乌托邦主义到来的活动分子。……无论如何，激进的活动分子与激进的科学家们（乌托邦分子们）必须走到一起^①。

^① Harvey Wheeler, "The Limits of Confrontation Politics", *The Center Magazine*, Vol. III, No. 4 (July 1970), p. 39.

只有通过各方努力合作采取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在“发达”社会里取得所希望的变革，因此，从原则上讲，我们不反对将“发展”一词视为起链接作用的词汇。

为了使那些尚未脱离保守渐进主义^①的人更容易理解“发展”这一词，我们需要重新为其作出定义，剥离其神秘色彩，并且把它放入道德辩论领域中进行讨论。如果我们批判性地使用这一链接词汇，它就有可能为人们带来新的启示并使得很多人纵身跳进“解放”的队伍中去。然而，只有在接受了我们先前所阐述的有关发展的第三种观点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可以作出这自信一跃的适当跳台。其原因是，在这三种观点中，只有这一观点合乎道德、充满价值观并具有人性，根植于历史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我所描述的各类人物能够接受解放这样的词汇之前，我们必须表明，一般所理解的“发展”一词甚至会异化它的受益者，使他们陷入强迫性消费、各种各样的技术决定论、生态恶化和好战的泥潭里。最糟糕的是，它使得那些受益于发展的人变成与他人同流合污的人，共同使其他国家变得不发达。很显然，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其目标并将其视为一项人类工程的话，我们会发现，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关发展的词汇，这些词汇互相冲突，为了打碎禁锢的现实，必须从中找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将首先在第三世界中诞生，它将能够表达人们不愿成为历史的奴隶而要成为历史的主人的一种不断增强的意识。其关键词汇是自主和创造新的未来的意愿。而在“发达”社会里也将出现一种与从前相反的有关发展的再定义。在第一世界里，人们盲

① 关于保守渐进主义与创造性渐进主义的区别，请参见 Denis Goulet, *Is Gradualism Dead?*,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0.